



|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 丛日云 卢春龙 / 主编 |

MICHAEL BRINT

【美】迈克尔·布林特 / 著

悲剧与拒绝

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差异政治

Tragedy and Denial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庞金友 / 译

曹 钦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 丛日云 卢春龙 / 主编 |

MICHAEL BRINT
【美】迈克尔·布林特 / 著

悲剧与拒绝

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差异政治

Tragedy and Demerit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庞金友 / 译

曹 钦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剧与拒绝：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差异政治 / (美) 布林特
(Brint, M.) 著; 庞金友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0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7813 - 5

I. ①悲… II. ①布… ②庞… III. ①政治哲学 - 研究 -
西方国家 IV. ①D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9103 号

·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

悲剧与拒绝：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差异政治

著 者 / [美] 迈克尔·布林特

译 者 / 庞金友

校 者 / 曹 钦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姚冬梅

责任编辑 / 桂 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 (010) 59367127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58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813 - 5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2 - 9348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RAGEDY AND DENIAL: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By
Michael Brint

Copyright © 1991 by Westview Pres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estview Pres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 RESERVED

本书根据 Westview Press, Inc 1991 年版译出

总 序

丛日云 卢春龙

政治文化研究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政治学中最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也是成果最丰富的研究领域之一。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政治系统的心理取向，包括所有与政治相关的信念、价值和态度等。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就是“针对政治对象的取向模式在该民族成员中间的一种特殊分布”，是“内化于民众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的政治系统”。当代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英格尔哈特把政治文化定义为“与一个群体或社会流行的政治信念（beliefs）、规范（norms）和价值相关的所有政治活动”。

政治文化是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在寻找政治因果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解释变量。因而，在西方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源远流长。英格尔哈特在追溯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渊源时，曾列举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品和成果，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的

《论美国民主》、阿道尔诺的《威权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拉斯韦尔的《民主性格》(*Democratic Character*)、斯托弗的《共产主义、一致性与公民自由》(*Communism, Conformity & Civil Liberties: A Cross Section of the Nation Speaks Its Mind*)、罗基奇的《开放和封闭的精神——对信仰和人格系统性质的调查》(*The Open and Closed Mind: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and personality systems*)等。此外，一些学者还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列入其中。与当代科学化的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政治文化研究相比，这种研究在方法论上被视为“非科学的”，但也有其重要价值。在中国，自19世纪末起，学者们在讨论中西文化关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时，也大量涉及政治文化的内容。

布林特教授曾区分和全面梳理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三大谱系，即法国的社会学谱系、德国的文化哲学谱系以及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法国的社会学谱系开始于孟德斯鸠，经过卢梭、斯戴尔、贡斯当、基佐以及托克维尔的发展而成为一个重要流派。这一流派强调从社会宏观背景的差异去理解各国政治文化的差异，进而理解各国政治制度的差异。德国的文化哲学谱系开始于康德，经过赫尔德、洪堡、黑格尔、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发展而成为一个重要流派。这一流派强调解释学的传统，强调政治文化并不是对客观社会现实的抽象反映，而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象征、图腾长期积累的产物，强调从解释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历史由来。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开始于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开创性研究，这一谱系主张通过实证的、科学的方式来研究

政治文化，从而克服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弊端，他们在方法论上主张以对各国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调查为基础，进而对各国的政治文化进行精确的科学测量。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以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为主流。1956年阿尔蒙德正式提出“政治文化”概念，1963年他又与维巴合作出版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此为当代科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亦即跨民族的抽样数据研究的开端。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派伊的《中国政治的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斯里德曼的《人格与民主政治》（*Person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英格尔哈特的《寂静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的价值与政治行为方式》（*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本菲尔德的《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等。

进入20世纪7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思潮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和挑战，许多学者批评它保守、静止、简单，存在文化偏见和文化决定主义倾向，低估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作用，不具有解释力和预见性等。政治文化研究一度走向衰落，退居政治学的边缘。但是，从80年代起，政治文化研究经历了从“回归”到“复兴”进而走向繁荣的过程。英格尔哈特在1988年最早使用了“政治文化的复兴”这一概念，而后，H. J. 威尔达、阿尔蒙德和布林特等人也肯定了政治文化复兴的到来。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大批有影响、有重大原创性贡献的成果问世：英格尔哈特的《发达工业社

会的文化转型》(*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人类发展时序》(*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与维尔泽合著)，英格尔斯的《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 A Psycho - Social Perspective*)，尤斯拉纳的《信任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普特南的《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布林特的《政治文化的谱系》(*A Genealogy of Political Culture*)，狄百瑞的《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A Confucian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达尔蒙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与民主》(*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等。

政治文化研究关注政治系统的内在心理层面，强调政治文化是决定政治主体的行为准则和支配其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因此，政治文化对于了解一个国家正式制度框架下的政治行为，理解历史上一个国家特殊的发展模式，都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政治文化研究还特别与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研究有密切关系，它与经济发展、公民社会、国际环境、政治战略、政治精英等一起，构成解释一个国家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与模式的重要的自主性变量。

政治文化研究在今天的中国更有一层特殊的意义。中国文明

作为世界上独特的文明，也是规模最大的文化单元，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在当代社会政治转型时期，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发生了何种变化？变化的方向是什么？它对于政治发展、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公民文化建设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都需要当代学者作出科学的调查和分析。只有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的分布状况和变化趋势了然于胸，才能明确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道路选择，才能积极有效地推动传统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型。但是，目前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仍然以学者的观察、粗糙的文献分析为主要手段，以对传统政治文化的阐释性研究为主要内容，这种研究虽然富于学理性和启发性，但是，没有科学的量化数据为基础，也缺少实际操作性，尚不足以为当前政治改革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

为了推动我国的政治文化研究，需要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理论和经验，也需要直接引进西方的一些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虽然国内学界许多人都在谈论政治文化，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对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只有零星的译介，大量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对于国内学者来说还是陌生的。这是国内政治文化研究长期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

有鉴于此，我们编译了这套《政治文化研究译丛》，希望为国内学者的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我们期待着，这套丛书的出版，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政治文化研究，推动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走向繁荣，贡献出一批与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地位和独特性相称的研究成果。

致 谢

承蒙弗吉尼亚大学校友会、夏季奖助金项目以及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在此向他们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我也要感谢西方视野出版社的斯宾塞·卡尔、辛蒂·赫施菲尔德以及爱丽丝·科尔维尔，他们的才能、敏锐和智慧为这本书的最终出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感谢热心的《政治与政治理论评论》的编辑们，允准我重新出版部分关于卢梭的论文。感谢大卫·托马斯、彼得·厄本、吉姆·凯撒、但丁·吉米诺以及迪克·罗蒂，他们给予我友情、评论和建议。还有那些不得不忍受我提供的大量政治理论阅读材料的研究生及本科生们，请接受我真诚的歉意和感激之情。我要特别感谢玛格丽特·布拉班特、里德·库什曼、梅里迪丝·加蒙、斯图尔特·霍尔、约瑟夫·哈德、大卫·海尼甘以及斯科特·罗利尔。威廉姆·韦弗不仅给予了富有价值的评论，还承担了整理书稿的任务。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我的妻子卡米尔以及我们的儿子布赖恩带给我欢声笑语与盈盈爱意，我高兴地将这些论文题献给他们。

迈克尔·布林特

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

中译本序言

T. S. 艾略特 (T. S. Eliot) 曾说过, “但丁和莎士比亚瓜分了世界, 没有第三者再能涉足。”艾略特并非要通过这个说法论证说, 但丁和莎士比亚展示了一场要一分高下的激烈竞争——谁是最优秀的欧洲作家。艾略特的意思毋宁是说, 这两位作家证明了地中海——欧洲历史的一个深层分歧, 这一分歧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期关于“一与多”的悖论。就但丁而言, 他把世界看成一个单一的统一整体, 此整体内部充盈着与其相生相伴的理性秩序。他的神圣“喜剧”(《神曲》) 提供了一种统一、和谐且同步的独特视景: 世界是整体性的, 是“一”。而莎士比亚却描述了一个更具悲剧性的情境。在此情境中, “时间是脱节的”, 矛盾、张力及不和谐因素构成了“多”的世界。对他而言, 痛苦深植于这个世界及其分裂之中。

这部作品的主题, 正是一与多、喜剧与悲剧、统一与差异之间的基本分歧。我衷心希望它可以解决“西方”政治文化中最为不可避免且持久的诸多议题之一。这一议题在今天的欧洲与北美以多种形式呈现, 我们可以轻易地将其辨认出来。现代民主政治如何既保证个人的表现, 同时又能够保持政治的统一? 这是个问题……

我很荣幸有机会与我的中国同仁们分享这项成果。

第一版序言

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奠基者来说，去了解诗人必须据之以讲述其故事的模式，乃是合宜的。^[1]

——《理想国》，379a

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轮廓是由如下因素所塑造的：我们各种不同的感知和理解；我们所运用的伦理和政治原则；我们所遵守的惯例、习俗和礼节；我们解释和辩护自己行为的方式；我们所面对的根本分歧和冲突；尤其是，我们通过故事所进行的本民族的历史叙事。我将要论证，在我们文化之中或与其相关的一些最著名的故事，可以在政治思想史中发现。

但是在这种传统中，有一类故事经常被忽略。在讲述故事时，政治理论家往往倾向于忽视、避开或掩饰 A. C. 布莱德利（A. C. Bradley）所说的悲剧（Tragedy）的“基本事实”。布莱德利说，“大家都会同意所有的悲剧中都存在某种冲突——感情、

[1] 这段话源自《理想国》第二卷中苏格拉底与阿得曼托斯的对话：“我亲爱的阿得曼托斯啊！你我都不是诗人而是作为城邦的缔造者在这里发言的。缔造者应当知道，诗人应该按照什么路子写作他们的故事，不许他写出不合规范的东西，但不要求自己写作。”参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73~74页。——译注

思想方式、欲望、意志、目的的冲突，人与人、人与环境以及人与自己的冲突。依情况的不同，可能会是一种、几种或所有这些种类的冲突。”^[1] 悲剧在于，这些冲突与其说是善与恶之间的战争，不如说是善与善之间的战争。

政治理论家往往至多是对这些价值冲突表示惊奇。有些人干脆拒绝承认互相竞争的善观念（conceptions of good）之间冲突的存在。他们坚持认为，根据逻辑和定义，善是不能与自身发生冲突的。但是，只要我们的信念是处于争论中的或可以修正的，只要我们依旧被人类生活的伦理不确定性所困扰，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将面对不同且相互竞争的信念结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领域以及社会与政治实践的道德形态。在两个可欲的、急切的、正当但不相容的行动方案中被迫做出选择，是全部人类经历中一个无法逃避的命运。

其他那些承认存在不同善观念的人则争辩说，这些善可以通过原则、程序、优先规则或社群共识来校准和权衡。在这些作出评判的例子中，人们经常用到对不同的善的观念加以平衡的比喻（Metaphor）。但是如果处于冲突中的价值是截然不同的，就很难看出可以用何种校准或权衡体系对它们加以平衡。事实上，需要加以平衡的，并非这些相互冲突的不同价值，而是相对于其他标准的分量——这些价值已经根据那些标准而转变了。换句话说，在悲剧性冲突中成为问题的价值，并不是在假定的权衡与衡量标准上有所不同，而是彼此互不相同。它们构成了描述我们伦理与

[1] A. C. Bradley, *Oxford Lectures on Poe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70.

政治行为的对立方式。由于它们彼此不同，悲剧性冲突就拒绝了那些以转换和评估之标准为基础的简单解决方案。

最终，纵观西方政治传统，我们发现了声称从人类社会中消除悲剧本身的特殊设计。这些思想家主张，如果能依据所需的统一性、和谐性与同步性原则而生活，我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将悲剧从人类生活经历中彻底清除。尽管消除人类悲剧的愿望或许可以被描述为政治思想中最古老最崇高的目标，但它也可以被描述为政治思想中最持久的失败。这些设计失败的原因，与在其之前的描述性建议失败的根本原因相同，他们都否认相关道德差异的意义。

悲剧植根于人类不同价值与利益的差异的现实之中，人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哲学推论将其从人类生活中消除。拒绝面对这个现实，乃是政治勇气的一种失败。最坏的情况是，它是一种用理性来强迫服从的尝试。问题不仅仅在于，一个没有差异的世界在实践中是一个令人觉得索然无味的世界。毋宁说，问题在于，即使我们能够建立这样一个世界，一个承认和尊重我们道德差异的世界对我们才是更可取的，哪怕我们由于这些差异的内在性质而无法逃避悲剧。 2

本书致力于批判性地考察西方政治传统中的悲剧和对它的拒绝。在第一部分里，我将考察柏拉图和卢梭讲述的故事中对差异的拒绝。我将从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中的繁复的故事开始，它是以一种反讽模式（*ironic mode*）所讲述的反悲剧叙事。^{〔1〕} 用不

〔1〕 关于流派（*genre*）与类型（*mode*）的差异，请参看 Alastair Fowler, *Kinds of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06–130。政治思想史中包含的叙事不仅仅是无足轻重的文学点缀。相反，它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语言游戏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交际的实践，文本的叙事文法配以并编排了论证、概念、事实和逻辑之间的相互联系，以此强调整体的戏剧性效果。反过来，整体的叙述性结构表达了文本的政治论证和视野。这正是那种政治理论家在表现和重组政治生活时会讲述的故事。

太专业的术语来说，我将强调柏拉图在借苏格拉底之口所讲述的反悲剧故事中所持的反讽性立场。通过关注分析中的反讽方面，我想这样解读《理想国》：它是一个建构自身同时又解构自身的文本，是一个既讲述自身又消解自身的故事。在我进一步明确论述《理想国》中悲剧与反悲剧（Antitragedy）的主题之前，让我先就反讽（Irony）说上几句。这个次级主题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不止一次出现。

我必须承认，无论是作为分析模式还是艺术，我并不认为，反讽全然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好。当然，我很清楚，这种反讽性的解读方式在当前极其时髦。我也很欣赏作为理论工具或武器的反讽所具有的力量。但是正如斯塔尔夫人（Germaine de Staël）近两百年前所注意到的，由于反讽强调嘲弄、轻浮、表层技巧和小聪明，它太过于可疑、令人无法信赖、令人失望。用她的话来说，它“太法国化”了。^[1]然而，尽管反讽在当前很有吸引力，但正是由于这种吸引力，许多人，尤其是那些被解构（deconstruction）所迷住的人，忽略了反讽的局限。尽管它能够颠覆和搅乱了语言交流的清晰性——西方世界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但是反讽并没有开创新的前景。

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尽管柏拉图有时被看作西方形而上学的正宗创始人和始作俑者，但他无疑是西方传统中最伟大的反讽家之一。许多人已经认识到了柏拉图《理想国》中不同层面上的反讽，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它的局限性。在叙

[1] Germaine de Staël, *De l'Allemagne*, ed. Jean de Pange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959), tome 4, 64.

事的层面上，这些局限性存在于他无法逃脱重复和否定的无限循环里，而这种循环是内涵在他自己讽刺的寄生本质之中的。在挑战苏格拉底的理想图景时，柏拉图在使用自己的反讽时“并没有变更领域，而是重复暗含在基本概念和原初问题里的东西，也就是使用房屋中可利用的工具或石头来对抗面前的大厦。对于语言也是如此”。^[1]当然，问题在于，继续停留在这一领域，柏拉图就得冒险证实和重申他据称要解构的东西。由于反讽模式既肯定又否定，由于它要不停地重复自己所否定的东西，柏拉图永远无法将自己从苏格拉底的文字城邦的语言中摆脱出来。作为一个追随者，他必须先将苏格拉底式的城邦高举上天，然后在无尽的反讽中将其夷为平地。 3

对比古典戏剧通常互相联系的三个主题，苏格拉底的反悲剧艺术（antitragic art）能够得到最好的理解。首先，悲剧作品倾向于关注人类脆弱性的主题，尤其是人类生活面对道德幸运或不幸的偶然力量时的脆弱性。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将从幸运到不幸的变动描述为复杂悲剧情节转折的典型主题。与此相反，苏格拉底的言辞城邦（city of words）中所表达的反悲剧图景，则建立在克服政治生活与人类幸福之偶然性的可能性之上。^[2]

除了对非脆弱性的寻求外，苏格拉底的反悲剧图景是以他对语言纯洁性和清晰性的要求为基础的。事实上，语言交流的清晰性对苏格拉底探寻“正义为何”至关重要。这将我们带入了苏格

[1] Jacques Derrida, “Les Fins de l’homme,” in *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72), 162.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all translations in the book are my own.

[2] See Martha Nussbaum’s nonironic reading of the Republic in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拉底和悲剧之间的第二个对比：悲剧作品经常具有语言暧昧和词语多义的特点。^[1] 悲剧叙述不是去试图发掘像正义这类术语的明确含义，而是敦促我们区分各种不同的语义场（宗教的、司法的和军事的），正义一词的多样性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在这些语义场中被认为是适当的。

最后，正如我们已经见证过的，古典悲剧经常展现文化价值和伦理实践不同领域之间的冲突，这或许可以说是古典悲剧最显著的主题。例如，建立在亲属关系上的价值，通常被展现为与基于城邦及其荣誉的价值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传统上是依据性别差异来构想的。而在另一边，苏格拉底则试图依据其专业分工原则来解决这种人类的悲剧。他依照某人的自然属性（*physis*）来定义那人的美德（*arete*），从根本上转变了在荷马和古典文本中通常与性别相联系的价值。他争辩说，就一个护卫者履行其职责的能力而言，他与生俱来的卓越性的实现与性别无关。他声称，实现该职责所必备的正直这一道德原则与个人品性和灵魂有关，而与其体质或性别无关。

尽管我同意美德并非取决于性别，但苏格拉底仍只不过是合并、浓缩和削减了各种复杂的功能，人类通过平等但不相同的美德在伦理生活中表现出这些功能。按照他的专业分工原则，每个人都应当履行在本性上最适合他或她的单一职责。表面上，苏格拉底似乎由此而强调了对其城邦差异性的、特殊化的贡献的重要性。但

[1] On this point, see Jean-Pierre Vernant's essays, "Tensions et ambiguïtés dan la tragédie grecque" and "Ambiguïté et renversement. Sur la structure énigmatique d'*Oedipe-Roi*," in Jean-Pierre Vernant and Pierre Vidal-Naquet, *Mythe et tragédie en grèce ancienne* (Paris: Maspero: 1972), 19 - 49, 99 - 133.